

出国别“撒野”

“海外过度维权”的烦恼



▼2012年,中国出境公民人数超过8300万人次。图为中国游客在纽约华尔街参观。 新华社

▼大陆执法机构纵容,被认为是导致大陆游客在海外“过度维权”的原因之一。图为,旅客冲进昆明机场停机坪,阻拦飞机起飞。 广州《羊城晚报》

1 司长的担忧

“在(海外)机场,航班延误只要超过4个小时,我们就开始紧张,可能会引起群体性事件。”

“沉重”是一位来自海南的大陆网民。2013年7月9日,在结束台湾的行程后,“沉重”和自己所在旅游团的团友来到台湾桃园国际机场准备返回大陆。

综合北京国际在线、人民网报道,正在办理登机手续时,“沉重”忽然听到行李托运处传来高声叫骂,当时正是机场办理业务的高峰期,不过尽管客流量比较大,但大家都遵守秩序,互相谦让,没有人高声喧哗,十分安静有序。

“在这样的环境下,这样高声的叫骂太刺耳了!”据“沉重”描述。“沉重”循声找到行李托运处时,发现那里传出的叫骂声已经吸引了很多人围观。他挤进人群,

只见一名衣着华丽的女子正对着一名行李托运处的工作人员大声责骂,但对方一直保持克制,一边低着头办理业务,一边小声做着解释。但换来的却是“你们(台湾)本地人有什么了不起”等更难听的责骂。

“沉重”听了一阵才明白,原来这名女子是一位大陆游客,可能是对机场办理托运行李顺序不满,因此大发雷霆。

大陆游客在大陆大闹机场已不是什么新闻,如今这种状况已经开始蔓延到港澳以及海外。

对于这种情况,中国外交部领事司司长黄屏非常担忧。

2013年12月7日,黄屏在接受大陆媒体采访时感慨:“中国公民

过度维权是最多的,尤其是在机场,当出现航班延误,只要超过4个小时,我们就开始紧张,可能会引起群体性事件。”

据了解,中国领事中心今年处理的近4万宗各类领事案件中,有一半以上是由于中国公民自身原因造成的。而在不文明出游的案件中,过度维权行为数量最多。

针对过度维权,黄屏还举了一个非常极端的例子。

他说,“有一次在肯尼亚,一些大陆游客采取了非常不理性的做法,站到传送带上,不让人家托运行李,把执行其他航班任务的机组阻拦住,抢了人家的行李,不让人家飞,有的是站在柜台上大吵大闹,影响特别糟糕。”

2 纵容惹的祸

维权意识压倒法律意识,一些执法机构的法不责众心理,也纵容了“过度维权”。

“最主要原因,一些人在国内习惯了‘过度维权’。”对于大陆游客为何会在海外过度维权的疑问,北京《新京报》做出上述解读。

2012年4月11日,在上海浦东机场,有20名左右旅客因天气原因滞留在浦东机场,后在赔偿问题上未能与深圳航空达成一致,遂冲出登机口,跑到邻近滑行道附近,一架正在滑行道上的航班因此停止滑行。两天后的4月13日,因为航班延误,广州白云机场再次上演旅客冲入停机坪事件。

同年8月5日,昆明长水国际机场遭遇雷雨,10架次航班被延误,大量旅客滞留。至6日凌晨,去重庆的旅客和去西双版纳

的旅客又都要求自己的航班先飞,在登机口发生口角和冲突。当天上午8时,竟有30多名乘客冲到停机坪,坐在飞机滑行的跑道上不愿离开。有人说:“既然我们走不了,也不让其他飞机走。”

《新京报》认为,大陆一些乘客遇到航班延误,动不动就占领柜台、跑道,维权意识压倒了法律意识,而一些执法机构的法不责众心理,也纵容了“过度维权”。

在大闹上海机场事件中,深圳航空最终以赔偿每名旅客1000元(人民币,下同)并协助改签了事。事后,上海警方是对游客进行了轻微的治安处罚。而广州警方并未对大闹白云机场的旅客进行追责。

不过,也有大陆媒体认为,游

客海外过度维权,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权利保障不足带来的恐惧。

济南《齐鲁晚报》认为,大陆民众已经见惯了国内航班延误的常态化,更为糟糕的是,许多航空公司以及机场管理方,对航班延误的善后处理水平低劣,不仅缺少必要的经济补偿,更缺乏细节上的人文关怀。民众的不满与愤怒就这样一点一滴地积累起来,最终酿成对航空公司及机场的情绪爆发。到了海外,自然就多以国内惯例应对。

上述报纸称,大陆本地的旅游业处处存在高价低质现象,让当惯了“冤大头”的大陆游客,几乎是时刻保持高度的警惕。到了更加陌生的海外,这些习惯很可能会强化。

近年来,中国人走出国门的步伐越来越快。从当初的小心谨慎甚至唯唯诺诺;到现在的大气自信甚至蛮横无理,中国人在海外的形象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近期,“海外过度维权”一词在大陆被炒得很热。据中国外交部领事中心近日透露,今年处理的近4万宗各类海外领事案件中,有一半以上是由于中国公民自身原因造成的。而在不文明出游的案件中,过度维权行为数量最多。

是什么让中国游客这么热衷于“过度维权”,这种维权行为到底对还是不对呢?

3 安全提醒短信

“不妨抽出半分钟浏览一下短信内容,从中对当地法律法规和风俗习惯有一个初步的了。”

除了大陆本土社会环境的因素,“对在海外正当权利、义务,对当地法律制度了解有限,对维权的方法和尺度认识模糊。”也被《新京报》认为是大陆游客在海外“过度维权”的原因之一。

中国外交部领事司和领事中心表示,已针对中国公民海外出游“过度维权”过多问题作出应对,包括把文明旅游内容明确纳入旅游合同之中,向出国公民手机推送海外安全提醒短信服务等。

从2013年9月开始,在到达目的地的那一刻,赴海外旅行的中国公民收到安全提醒短信的同时,也可以收到内容丰富、各具特色的文明旅游提示内容了。

黄屏表示,短信中的文明旅游提示内容都是根据各国不同情况而个性化拟定。

黄屏提醒游客一定要学会如何使用这些短信。

黄屏提醒,“别把海外安全提醒短信随手当作垃圾短信删了,

因为里面有重要的信息,遇到紧急情况时可以按照短信中提供的中国使领馆联系电话寻求领事协助。”

黄屏还建议中国游客,“不妨抽出半分钟浏览一下短信内容,从中对当地法律法规和风俗习惯有一个初步的了解,在旅游过程中表现出中国游客的文明素质,这很大程度上可以大家避免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和损失。”

“一个国家国民的行为方式不会因为所处环境的变化而发生根本转变。”北京《法制日报》称,“过度维权”有损中国人文明形象,要根本治理还是要从在国内的行为下手。

上述媒体认为,大陆警方和司法机构面对当前社会上流行的以“闹事”来解决问题的“过度维权”应该理直气壮地依法处理,毫不犹豫地说“不”。只有这样才能树立法律的权威,从根本上消除中国人“一闹就灵”的心理。

4 崛起亢奋症

“中国要适应世界,世界要适应中国,这是不同文化的融合,某种程度上我们成长得太快了。”

“大陆人一到海外的机场,就像小鸟一样,叽叽吱吱说个不停,而且都是无聊事儿。大致意思就是,我出国了,我这自由了,就像出了笼的鸟儿一样,这种旅游的变态的心理。”针对中国游客海外的不文明行为,香港凤凰卫视评论员陶杰曾好不客气的批评。

陶杰认为,近十年来,GDP每年8%、9%的发展速度,让中国人的财富高速提升,但是文明素质却没有同步,所以就形成这种大国崛起的情绪亢奋症。

2012年,中国出境公民人数超过8300万人次,2013年这一数字可能突破9000万。

而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初,到1979年改革开放前的这30年的时间中,中国出境总人数还

不到30万。

作为从事了十几年领事工作的资深外交官,黄屏见证着中国人“走出去”的步伐越来越快。

黄屏说:“我们太需要了解对方的文化,中国要适应世界,世界要适应中国,这是不同文化的融合,某种程度上我们成长得太快了。”

《新京报》认为,在海外旅行时仍保持维权意识,这本身是中国公民对自身权利意识的认识、觉醒,是一种时代的进步。要杜绝“过度维权”,也必须维护海外中国公民“适度维权”的正当要求,中国外交机构和驻外外交人员也应切实落实各项领事保护义务,让海外中国公民感受到自身正当权利的存在,和“适度维权”的可行、有助。